

中国文化史丛书

# 转轮圣王的东方之旅

—中国佛教

许道胜



203

1-20

沈阳出版社

# 转轮圣王的东方之旅

——中国佛教

聂一然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 主 编

张岱年

## 执行主编

朱立元

##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 总策划

石铜钧

##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 目 录

- 一、白马东来  
——佛教的传入 ..... (3)
- 二、法轮滚滚  
——魏晋南北朝佛教 ..... (15)
- 三、佛日高悬  
——隋唐佛教 ..... (32)
- 四、大乘八宗  
——中国佛学宗派的演变 ..... (44)
- 五、禅源流长  
——中国佛学之殊胜 ..... (63)
- 六、法难  
——三武一宗灭佛事件 ..... (72)
- 七、晨钟暮鼓  
——五代宋元明清佛教事略 ..... (82)
- 八、人海灯  
——代结语 ..... (97)

## 引子

乔达摩·悉达多原是喜马拉雅山麓的小国释迦族的王子，他在公元前六世纪，于菩提树下静坐悟道后，即开始四处弘扬佛法，创立了佛教。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世尊或佛陀。佛陀圆寂后，他的弟子四次结集，写成了浩瀚的三藏典籍流布于世，成了佛教发展的文字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教义逐步成熟，僧伽团体渐渐壮大，戒律仪式一天天完善，信徒遍及世界各地，这些使得佛教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之一。

东汉初年，佛教经过海陆两路传入中国。佛教教义和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接近使得佛教很快就为中国人所接受，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扎根、繁茂，成了中国人文化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经近两千年了，中国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写出了一部丰富多彩而又极度深刻的中国佛教史。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慈爱乐观的弥勒菩萨，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地藏菩萨，智慧善辩的文殊菩萨，大行度世的普贤菩萨，都早已扎根于中国的名山大川，住在中国民间百姓的意识里。敦

煌壁画、佛教石窟、各地的佛寺建筑以及悠悠梵呗，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佛教影响下的灿烂文化随处吸引着每一位中国人和外来游客。道安、僧肇、窥基、慧能、太虚等多不胜数的学者僧人，他们的思辨占据了我国思想史的很大篇幅。幽深、飘逸、洒脱的“禅”，更为一辈辈人所向往，影响了不知多少中国文人和他们的文学、绘画和音乐创作。佛教在中国走过了一段段漫长的历史，佛教早已是中国人的佛教。中国佛教的两千年演变史和它幽深思辨的义理，不知为多少人所惊叹、倾倒。今天，我们学习它、研究它、写它，又怎能见其一斑？

# 一、白马东来

## ——佛教的传入

佛教向中国的传播主要经过两条交通路线。一条是海路，经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中国南部的交趾（今天的越南北部）、广东。求那跋陀罗、真谛、佛驮跋陀罗等精通三藏的印度高僧都是通过这条南海路线而到达中国的。后来称这条路线传来的佛教为南传佛教，主要是指流布于岭南一带的小乘佛教。一条是陆路，经中亚细亚及新疆到达中国，后称北传佛教。自西汉武帝通使西域以来，这条陆路成为东西方贸易、旅游的主要交通干道。往返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僧侣走这条陆路的比走海路多，印度的许多高僧大德大多是通过这条路线来到中国的，唐玄奘法师也是由这条路线到达印度，然后求取佛经返回的。新疆是中印陆路交通的要冲，气候变化无常，中有高山沙漠阻隔，作为交通路线的条件极其恶劣。这条路线又分为北道和南道。北道是指由敦煌北上至伊吾（今哈密），经由吐鲁番而至龟兹，然后到达疏勒的一条路线。也即通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天山南麓的一条路（天山南路）。南道是指由敦煌越过沙漠，经鄯

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昆仑山脉北麓，到达于阗，再向西北前进而到达莎乐的路线。三国时代的昙柯迦罗、康僧铠、昙谛等也是由此道相继来到洛阳的。这条陆路交通线最重要的地方是于阗、龟兹及越过葱岭的印度犍陀罗，也就是到印度求法取经必经的所谓罽宾三国。

佛教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思想，但是它的最初传入和为中国人接受却扑朔迷离。关于佛教的传入时间与方式的诸多传说更为佛教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据刘宋宗少文《明佛论》记述，唐虞时代协助大禹治水的伯益作《山海经》，其中说到天竺之国有慈爱之人名佛屠，暗示禹时已知有佛。关于佛陀的出生，在中国的史书上也有神奇的传说记载。三国时谢承撰《后汉书》记：佛在癸丑七月十五日寄生于净住国摩耶夫人腹中，至周庄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降生，当时恒星不见，但夜晚却明亮如昼，这是佛陀应化世间的瑞相。《魏书·释老志》对这一段也有记述。《周书异记》写得更详，把佛陀的降生时间上推至周昭王之世：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涨，井泉之水外溢，宫殿屋舍、山川大地，皆悉震动，这天夜晚，五色先气入贯太微，整个西方都现作青红色。当时，周昭王问太史苏由：上天为什么呈现这种祥兆？苏由回答说：因为有大圣人生于西方，所以现此瑞相。周昭王再问天下将会变得怎样，苏由预言：目前还没有什么影响，一千年后他的声音教化将遍传东方国土。昭王就命人镌刻石碑记下此事。埋在南郊天祠前。那时正是佛陀初生于王宫的时候。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发现西方屡有祥光云气呈现，先听说苏由的记述，知道西方有圣人处世。穆王不解其理，害怕这与周道不合，于是同相国吕侯一起向



西方行走，招集诸侯会集于涂山，以干扰消除这种光变。这时，佛陀处于世间已久。到了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朗晴的天气突然刮起暴风，吹倒屋舍，折断树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动，午后天阴云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横贯南北，连夜不灭。穆王问太史扈多这是何征兆，扈多回答说：“西方有大圣人灭度，这是呈现衰现啊。关于释迦诞生的传说暗示了中国在西周时已有人知道佛教，而有的典籍记载，则明白地说佛教在西周时已经传入中国。如梁僧祐《弘明集·后序》说：《列子》称，周穆王时，西方有化人来，能入水火，移动山川，富于多种变化，既能变人之形，又能除去人的疾患。穆王敬之若神，事之如君。观其迹，认为是教化众生的菩萨。因而说佛法在西周时已有萌兆。《列子·仲尼篇》中有一段记述：太宰嚭问孔子谁能称作圣人？孔子动容地说：我听说西方有一位圣者，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据此，后人也推测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已知西方有一大圣者名佛。

至于中国人何时知道西方有佛，传说纷纭，这里不去分辨它的真伪，但可以说明中国人对佛陀的神秘观念。佛教在何时传入中国，也同样有充满奇异的记述。晋朝的王嘉撰《拾遗记》中说：战国末年，天竺国有一个一百三十岁的叫尸罗的僧人来到中国，他富于变化神通，能请神问仙。刘宋宗炳《明佛论》也说先秦时期在中国已经发现有阿育王寺，暗示那时的中国已有佛教活动。唐朝法琳在《对傅奕废佛僧事》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秦始皇的时候，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十八名贤者手持佛经来劝化始皇，始皇不听，并囚禁了他们。夜晚有六位金刚破狱，救出十八名沙门。始皇惊惧不

已，向他们叩首谢罪。这说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就有外国僧人来华，但这并不能作为考证资料加以确定。有说汉武帝时，中国人已知道佛教，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非不可能，而现存的资料却不足以证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佛教已开始从印度传播到大月氏一带。张骞受武帝的派遣出使西域，曾在犬月氏逗留一年多，应该说他有可能会对印度佛教有所了解。《史记》、《汉书》关于西域的记载主要是依据张骞回国后的介绍，其中也介绍了印度的地理位置、气候风俗，但并未提及佛教。无论怎么说，汉武帝加强对西域的沟通为佛教的传入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自汉武帝开辟对西域的交通以来，西域各国与汉地的政治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一直十分频繁。汉宣帝时，派卫司马统辖鄯善以西诸国，但对北道诸国还没能建立巩固的统治。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役属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判离匈奴而投降汉朝，汉方正式控制了西域南北道，任命原“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于龟兹东北的鸟垒城，负责管辖西域的诸事宜。从此，西域各国与汉的关系日益密切，使节、商贾往来不断，佛教便是在这样的相互交流中逐渐传播到内地的。一般认为，佛教的正式传入的开始时间大约是在两汉之际，即为公元一世纪时期。自此，佛教活动一天天的在中国大地上弥漫开来。

印度佛教逐渐传播到印度西北地区、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传播，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时期。在西汉末年西域各国到汉的外交使节以及商人中可能有一些佛教信徒，而这些人可能就是最初的传法者。三国时魏国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

元前12年)，博士弟子景庐听受大月氏王派来的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该经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比丘、晨门等，都是弟子的名号。口授佛经是佛教的传统作法。在公元前一世纪以前，佛教经典没有成文记载，全靠口头传诵，甚至东汉时我国早期的译经，也多从口授。景庐愿意接受伊存口授的《浮屠经》，说明佛教信仰在当时社会已经引起某些个人的注意。但这还不足以被确认为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因为并没有引起当时人的广泛重视。

关于佛教最早传入的故事中，东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最为著名，并且有较古的资料依据，世称永平求法。一般认为，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是佛教正式传入时间。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永平求法的史实最早散见于《牟子理感论》、《四十二章经》及《老子化胡经》、《后汉书》等典籍。据《牟子理感论》记述：汉明帝在睡梦中，见有一神人，身放日光，飞行而至宫殿前，明帝欣喜异常。第二天，询问群臣这是何人，其中有个渊博的臣子叫傅毅的说：我听闻西方天竺有位得道者，人们称之为佛，能于虚空中飞行，身体放光，神奇无比。明帝敏悟，于是派遣使者张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到月氏抄得佛经四十二章，收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这即被称作中国最早出现的佛经——《四十二章经》。当时汉明帝还在洛阳城西雍门外起造佛寺，在塔壁上刻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周；又在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永平十年，明帝派往西域求法的人在途中遇到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从他们那里求来佛像经卷，用白马载回。后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二僧应邀，先后来到了洛阳弘法传教。因此，后来关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传入有这样

的说法：基督教是八国联军用枪炮打进中国来的，伊斯兰教是与阿拉伯人做生意的商人带进来的，只有佛教是中国的皇帝请进来的，故而也说佛教历来就是中国社会上层人和富人的宗教。摩腾与竺法兰来到洛阳后，汉明帝予以赏赐礼遇，并在城西门外建立精舍让他们安住。据说他们的住处就是洛阳城西雍门外的白马寺。印度曾有过灭佛毁寺的事件发生，佛教寺院大都遭到破坏。相传唯有招提寺还没有被毁坏，有一天夜里，一匹白马围绕塔寺，长声悲嘶。有人把这件事报告国王得知，国王方立即停止破坏别的寺庙，并把招提寺改名为白马寺，因此后来建立的寺庙多以白马寺命名，以表张白马的护寺之功。至于汉明帝为安置印度沙门而建造的“精舍”当时并不叫白马寺，后来称之为白马寺想必与“白马负经”东来的传说有关系。现在我们把佛教徒聚居的地方称作寺院，也是有历史原由的。寺是皇帝安置外来使者的地方，相当于今天的国宾馆之类的地方。当时许多外国僧侣来到中国，很受皇帝的礼遇，就被安置在寺里安歇，后来就把出家人居住的地方统统称作“某某寺”了。白马寺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西晋距东汉不远，洛阳白马寺还是重要的译经场所。

由上述内容可见，佛教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逐渐传到我国内地。佛教传入之始，就得到中国社会上层人的信奉，这为以后佛教传播的深入拉开了序幕。我们还可以从下面的史实中看到在佛教刚开始传入时中国人信奉佛教的活动。

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信仰佛教的人。他在建安十七年（公元41年）为楚王，建武三十八年赴楚国就任。异母兄汉明帝即位后，对统辖很小的楚国的刘英很是怜爱。刘英年青时喜好游侠，爱结交宾客。当他被

人诬告意图谋反时，明帝于永平八年诏命天下，如果带罪之人献上绢即可免除死罪。英献绢三十匹，明帝下诏通报说，崇尚黄老和浮屠的楚王英无须嫌疑，应该退还他所献的绢，作为供养沙门的费用。由此可见，英兼信黄老和佛陀，经常在家里举行特殊的佛教仪式：三月洁斋。按照佛教的规定，居士在一年的正月、五月、九月的初一到十五日要严守五戒或八戒，不杀生、吃素食等，称之“三长斋月”。刘英献绢赎罪的事被公认为是东汉上层统治阶级在信仰儒教、黄老的同时又信仰外来佛教的左证。另外，刘英供养优婆塞（僧侣）和沙门这件事表明，不仅西域的外国僧已经来到了长安、洛阳，而且也来到了刘英的领地彭城（今江苏徐州）进行传教活动。后来刘英没落，被贬到江南丹阳（今安徽宣城）的泾县，楚国的佛教由彭城传到江南，得到了扩展的机会。佛教和当时的民间黄老信仰十分协调，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三月洁斋向神发誓的刘英，是把佛陀当作神来祭祀，当作以祈求现世利益和长生不老为主旨的宗教来信仰的。这种早期佛教的信仰内容贯穿了以后的中国佛教史，反映了中国佛教最基本的性质。

从文献上看，桓帝（在位时间147—167年）是东汉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他常在濯龙宫中祭黄老和佛陀。山东学者襄楷曾到洛阳上疏，劝谏桓帝建立黄老、浮屠之祠，说佛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节欲去奢。但是吸引桓帝的却不是佛教的伦理方面，而是把佛教看作同祈愿长生不老的黄老信仰一样。桓帝受炽热的成仙欲望的驱使，在祭祀黄老的同时祭祀佛屠，佛陀被他当作有去灾招福、长生不老之灵力的神来信仰。前来传道的沙门被当作扮演巫祝角色的修仙

者而受到尊敬。佛教传入之初，来弘法的和尚多变现神通以吸引信众，但同时也被中国人误认为佛教同追求现世功利与成仙得道的黄老信仰没有什么差别了。

东汉末年，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与外来佛教已开始有地位之争。我们也可以从二教的争论之中看出佛教在中国的蔓延与影响的加深。西晋末有道士王浮伪作《老子化胡经》之前，已经有老子化胡说的流传了。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襄楷上疏桓帝的奏章中写到：老子进入夷狄之地而成为佛屠，这是文献上第一次出现的老子化胡说。相传老子在函谷关写《道德经》后，出关西行，其行踪已不为人所知。据说老子是经过西域，到了天竺，教化弟子去了。这种把老子当成佛教创始人的传说不足为信。老子化胡说约形成于公元二世纪中叶，并流传开来。从这里可以推测汉代佛教的某些特点：为了使佛教这一异国宗教在中国传布，可行的手段和方法就是尽量让它和中国固有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调融起来，并且必须配合道士和方术家所提倡的长生不老术来进行。楚王刘英诵习黄老之微言兼信奉佛陀，并非是放弃黄老而改信佛陀，它崇拜佛教是因为把佛教的教义看成和黄老思想完全一致的缘故。汉桓帝在宫内并祭黄老和浮屠的目的也完全如此。

东汉末年，帝室势力衰微，人心动荡不安，思想也混乱起来。随着儒教地位的下降，人们普遍存在着厌世观念，从而导致老庄的虚无思想流行起来，佛教也相应的得到更多人的信奉。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位佛教史上留名的笮融。笮融是丹阳人，与当时的徐州刺史陶谦是同乡，他聚众数百人投靠陶谦，被任命为督管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粮食运输。笮

融本人信仰佛教，利用职权把三郡的钱粮用来大建佛寺。他所建的佛寺十分宏伟豪华，可容纳三千余人。同时他还铸造镀金的铜佛像，可以说真正铸造佛象当从笮融时代开始的。笮融还宣布凡是愿意信奉佛教者，都可以免除徭役。他用信佛免役的方法招引民户，前后招致民户达五千多。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在八十里的范围内铺席设酒饭招待前来参加法会的人，据说“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这是中国正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兴建佛寺铸造佛像和社会一般民众信奉佛教的情况。由此可见，在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佛教比以后在社会上有更大传播。

白马驮经，佛法东渐。经过漫长的适应时期，佛教终于与我国本土的思想风俗交融并迅速地传播开来，而且后来居上地赶超过了中土原有的各种宗教信仰。从东汉到隋唐的几百年间，佛教和我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取得融合，逐渐成为中国化的佛学。

印度佛教传入我国后，在中国广袤的地域生根、发展，逐渐嬗变为中国佛教，并形成许多派别。藏传佛教是在青藏高原地区经过长期传播发展，具有了民族性、地域性特点的宗教，同东南亚、日本甚至印度的佛教都有区别，也和我国内地佛教有不同的特点。在中国佛教范围内，藏传佛教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因此这里也略为介绍一下它的传播和发展情况。

国内国外大都把流传于青藏高原地区的佛教称为西藏佛教、藏传佛教或喇嘛教。喇嘛，是藏语音译，意为“上师”或“上人”。藏人称一般出家人为扎巴，只有对宗教寺院的首领和高僧才称喇嘛。但后来人们对扎巴也统称为喇嘛。藏传佛

教属大乘中观宗。它的特点之一是崇尚密宗。显宗信佛，要求皈依佛、法、僧三宝。密宗学法修行，特别注意师徒传承，必须皈依喇嘛为师，接受灌顶，除皈依三宝外，还必须皈依喇嘛，成为四皈依。藏语说：无喇嘛上人，如何得近佛！可见喇嘛是受信仰者特别崇敬的，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不过修行密宗者，主要是寺院的部分喇嘛，大部分僧众只习显宗，至于普通群众，一般都是口念“六字真言”（即唵、嘛、呢、叭、咪、吽六个字），祈神供佛，斋僧拜寺，布施功德，以期往生西方的信仰。佛教传入西藏是在公元七世纪左右，在几乎同一时间内，分别由我国内地和印度两路传入的，既有我国内地佛教也有印度佛教施加的影响，后在青藏高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为藏传佛教的特殊形式，继而扩展到蒙古和其他民族地区，发展为族际性、地域性的宗教，到公元十八世纪达到极盛。传播的地区包括今天的西藏全境，四川、云南和甘肃的部分地区，青海大部分地区，内蒙古地区，新疆的蒙古地区，还有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境内的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与图瓦自治共和国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地区。在我国信仰这一宗教的民族有藏、蒙古、土、裕固、门巴、珞巴、羌、锡伯、怒、纳西等少数民族。据不完全统计，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全国有大小喇嘛寺庙五千余座，以宗教职业为生的喇嘛人数约四十余万人，平均占各信仰民族人口的10%以上，个别藏族地区达到30%，占藏族男子的50%。著名的喇嘛寺庙有西藏的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甘丹寺；青海的塔尔寺和甘肃的拉卜楞寺，俗称黄教六大寺院。此外，还有桑耶寺、萨迦寺、粗朴寺、大昭寺等均以历史古老而著名。



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和当地原始宗教苯教相接触，经过长时期的斗争和互相影响，才逐渐形成为适应当地社会历史条件的、民族性的、地域性的宗教。藏传佛教的传播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中期的吐蕃王朝时期，是佛教传入西藏的时期，主要在上层统治阶级中传播。松赞干布统一奴隶制的吐蕃王国后，历代赞普都力倡佛教，开始建立一批小寺庙，令藏人剃度为僧，用藏文翻译了一批佛经，僧侣集团开始出现，藏族宗教史称这段时期为佛教的“前弘期”。但佛教与苯教的斗争持续不断，有时极为激烈，终于发生朗达玛赞普灭佛之事，佛教也因此顿见中衰，实则佛教信仰尚未深入民间。第二阶段：自公元十世纪至十四世纪，是藏传佛教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宗教史称为“后弘期”。这个时期，佛教重新活跃并较前一阶段更为蓬勃发展，一批又一批的藏僧前往克什米尔、印度学法求经，也有一些高僧来藏传经授徒，出现不少宗教学者，各树一帜的本地教派兴起；佛学大盛，经典的翻译、编纂、印刷日臻完备，创编了《大藏经》；新兴宗教势力与地方世俗势力相结合，逐渐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寺院和僧人大增，但出家与不出家的僧俗之分并不十分严格，信仰普及民间，并传播到蒙古等民族地区；这一时期本教已经衰落，佛教已成为藏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内部斗争却转趋激烈，带有明显的政治性。第三阶段：从公元15世纪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又称黄帽教，俗称黄教）起，格鲁巴寺庙集团形成，独立的寺庙经济膨胀起来，打破地域界限，以绝对压倒的优势取代其他教派，并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取得对西藏的政治统治权力。寺庙僧人组织更加严密，僧俗界限分明，出家与